

关于讨论中医现代化的三封信

钱学森 邹伟俊 王建平

一、钱学森同志给邹伟俊同志的信

(摘要)

邹伟俊同志：

杨春鼎同志来信介绍了您，并转来大作《在全国中医内科学会成立大会上关于中医多层次系统结构研究的发言》和《中医的多层次系统结构(要目)》。

您从中文系毕业改行行医十余年，又得家传，必已有一定的中医水平。我想这是目前学成为中医良医的正道。

因为您已有一定的中医水平，所以您具备了搞中医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您的见解是可取的。如果您也允许我这个外行提意见，我就说几句，供您参考：

(一) 人体是一个多层次大系统，影响这个大系统的因素很多，您举了九个因素。因素对人体多层次大系统的作用又相互交织在一起，搞不好就生病，搞好了由生病变健康。这是我们的基本认识。

(二) 我认为您要写的大文章，就是根据您的临床实践和中医理论，说明上面的道理。这是中医现代化的基础工作，中医医道用现代语言的阐述。我希望您成功。

(三) 要完成这件颇不容易的工作，我建议您看点系统科学的书和文章。掌握系统科学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大系统或甚至是巨系统嘛。

(四) 完成了这件工作，也还不是中医现代化的全部工作。因为还要从知其然深入到知其所以然，也就是从系统地现象描述深入到机理机制的阐明，要同现代科学、同现代科学最新发展挂上钩。这就更艰巨了。您若有志于此，就要下苦功学现代科学，科学是严格的，严肃的。

因我不懂医学，以上讲的可能错误，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二、邹伟俊同志给王建平同志的信(摘要)

王建平同志：

关于一度很热烈的中医现代化的讨论，目下有降温之感。但我仍坚信中医现代化是振兴中医的必由之路。我认为在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道路上，先必须完成如下三项工作：

一是中医多层次系统结构的基础理论研究。该项目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对中医体系作系统研究，恢复其具有人天观思想的中国自然医学的本来面目(自然医学的概念在国外用之甚多)。欣幸的是现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生态学平衡思想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医体系的良好条件，启发了我们从系统科学方面去认识包括哲学、天文、气候、地貌、心理、食物、药物、数学等多学科的博大精深的中医体系，帮助我们居高临下地去发现大量中医文献中所蕴藏着的关于人体生命的多层次系统结构理论(或谓人体生命巨系统理论)。若尽力对此作深入研究，也许可以打开我国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免走往昔“文献搬家”的歧途。令人高兴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从现代科学发展的高度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中医医道用现代语言的阐述”。我理解这个方法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逐步用现代语言(或现代科学语言)来合理地“注释”古代中医体系中的大量概念，二是在排除各种偏见和干扰的同时，全面地考察中医医道，做到对中医固有的完整体系心中有数。忽视前者，中医将缺乏与现代科学交流的共同语言，将会失去二十世纪中医发展的时代基础。但若对中医体系心中无数，则很有可能歪曲中医或重蹈昔年中西医汇通派先贤没有走通的老路，甚至延续“后继乏术”的悲剧。我们如果把完整的中医体系比作皮，把现代语言的阐述工作比作毛，那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两者岂不是一个很有机的辩证统一体吗？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研究，我曾在全国中医内科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略论中医的多层次系统结构》的初步介绍，旨在抛砖引玉，供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同道们参考。

二是关于中医定量和定性的研究。这是摆在中医界面前客观存在而回避不了的中医诊断技术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研究将尽可能地使以定性为主的中医变为具有更多定量形态的综合性自然医学体系，不仅便于为日后的中医人工智能研究铺开道路，而且也有

利于提高中医诊断水平。在这项研究中似可采用“拿来主义”的办法,即用具有状态学研究特点的中医基础理论来归纳综合西医在几百年间通过分析方法总结出来的一些人体生理病理的形态定量数值,用以丰富中医体系。实际上,目前很多中医不是已经把诸如西医血压测量数值、血象检查数值等用于中医临床了吗?看来,忽视利用西医中的定量内容,中医的定量研究将停留在粗浅的水平上,将会很可惜地放弃掉这方面很有可能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如果不以中医基础理论作指导,那就又有可能偏离中医的整体和系统研究的轨道,当然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中医的定量系统。

三是中医治养结合的临床传统的研究课题。所谓中医的治养结合,是指运用中医方药、针灸、导引、心理暗示等多种治疗技术和手段控制疾病(治已病),同时根据中医人天观理论及多因素环境致病学说,作旨在适应自然的人体调养,摄身治未病。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有可能扭转在目下仍然比较流行的“只以一煎方”(徐灵胎语)的狭隘临床局面,有可能真正发挥出中医在临床上所固有的雄厚潜力,从而普遍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

我认为,中医现代化是在当代科学发展的背景之下提出的。它必然要与当代科学的变化共沉浮。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等十分关注中医现代化,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信息。

贵刊一贯以振兴中医为崇高的目标,而且思路开阔,所以我一直是贵刊的热情读者,尤其喜欢贵刊所辟的中医现代化讨论专栏。故略陈管见。

南京市江浦县人民医院 邹伟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三、王建平同志给邹伟俊同志的信

邹伟俊同志:

拜读来信,很受启迪。您有志于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对此我深为钦佩。

您对中医现代化的那些设想,很有见地。搞科学研究,需要大胆假设。搞自然科学的人,也应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一点,是和文艺家相同的。记得恩格斯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设。”而大量实践表明:科学的假设对科学的发展常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您对中医现代化的一些设想,还有待于今后大量工作去验证。

如果从发展整个中医事业的战略眼光来看,贯彻衡阳会议上提出的发扬中医特色的精神和开展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是并不矛盾的,其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中医现代化的研究,离不开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的指导,

且是为了更科学地揭示其内在的规律。中医现代化的研究,也十分有利于中医药学理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中医已被公认是一门科学,但它又涉及到中医政策。贯彻和执行政策往往有左有右,但作为科学,是不分左右的。关于中医现代化,虽也涉及到政策问题,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属于学术问题。您只要有志于此,不管它是降温,还是升温,您完全可以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专心去研究。鉴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要拨出专门经费、组织专门人力,去打一场中医现代化的正规战和攻坚战,暂时有些困难;因此,你们这些有志于中医现代化的“民兵”先去打几场前哨战和游击战,闯出一条路来,则是好事。成功了,固然是好;失败了,作为反面教训来吸取,也是一大贡献。不知您是否同意我这样的看法?

记得一九七九年冬在广州举行的医学辩证法讨论会上以及一九八〇年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中医现代化的锣鼓声,确实热闹过一阵子。我曾有幸参加了这两个会议,考虑到中医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命题,我曾就如何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向卫生部有关领导和中医界的前辈多次请教。本刊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就是为活跃思想,启发思路,以利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这个断断续续的讨论在国内中医界引起了一定反响,甚至还越出国界,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我们预见到,真正开展中医现代化的研究并取得成果,则是十分艰巨的。远非一代人所能完成,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也正因为是这样,您在这方面当一名开路的先锋战士,是很光荣的。再一次真诚地预祝您取得成绩。

关于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既涉及到基础理论,也涉及到应用技术,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将来,如果国家在制订中医现代化的科研总体规划时,孰主孰次,一定有所考虑。至于目前象您这样打游击战的,则完全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选择最佳地形去打仗。应该说,在这方面的天地很广阔,愿您大显身手。如果在研究中有什么新的见解提出来暂时得不到人们的接受,乃至遭到反对,也不要灰心气馁。在学术上,我们应坚定地执行双百方针,提倡自由讨论,特别要扶植新生力量。而作为本人,则应虚怀若谷,既要不畏人言;又要有学者的胸怀,随时服从真理。至于对学术上持有某种新观点的人,采取学阀式的围剿,那显然是不对的。

钱学森同志很关心中医现代化的工作。我们也曾为此通过信。您有机会见到他的话,请代为问好。致敬礼!

王建平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